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建橋計畫 —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

莫大華
政治系
副教授

摘 要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正以建橋計畫隱喻不同學派之間的對話與綜合，其中建構主義內部的建橋計畫不僅涉及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或溝通橋樑，更關注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差異、對話與綜合，藉由研究方法多元論而使不同知識論主張的建構主義學者皆能有助於國際關係的經驗性研究，並以實用主義的知識論立場作為建構主義內部知識論的中間道路，以利於其內部的對話與綜合。此知識論的實用主義立場不免有著折衷的意涵，但理論與經驗性研究的實質效用是值得採取此立場。

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建橋計畫、建構主義、理論對話、理論綜合

* 本文曾接受國科會專案研究（編號：NSC 95-2414-H-135-001）經費補助，特此致謝。

前言

建構主義雖然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理論，而不再是邊緣理論了。但是就在建構主義嘗試作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via media, middle ground, middle way）或是溝通橋樑時，學者對於建構主義的本質仍是缺乏共同的理解，甚至有學者還批評太多的建構主義（Wight, 2001），而且建構主義學者本身之間也是需要相互對話（莫大華，2002）。不免有學者（Klotz, 2001）要問：「我們可以說一個共通的建構主義語言嗎？」，建構主義是許多學者所造就而成的，這些專業的建構主義學者提出不相容的假定，已經使得建構主義一團亂（Onuf, 2001:245）。因此，建構主義其本身存在著不同的類型與主張，是否都同意此建立中庸之道的主張？即使同意的話，是否又有不同的建立方式？這些不同的主張又是要如何對話，才能形成綜合的觀點？這是否又有可能呢？遂有學者（Christiansen et al., 1999; Wiener, 2001; 2003, Pouliot, 2004）以「溝通橋樑上的各站」（stations on the bridge）稱述建構主義內部不同的知識論觀點，尤其是源於社會科學哲學觀差異的不同建構主義，認為各站之間也必須進行對話（conversation），由於建構主義所共同的興趣是社會事實（social facts）的本體論，所差別的是知識論立場。簡言之，建構主義內部是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類型及主張，¹「建構主義研究並不是從同一塊布剪下來的（亦即不是一模一樣的）。」（Katzenstein et al., 1998:680），不同類型的建構主義學者之間也就出現許多爭論，尤其是針對 Alexander Wendt 以科學實在論為基礎所建立的建構主義，不同類型建構主義爭論的焦點在於因果解釋的傳統方法論，是否適合於理解及詮釋互為主體的意義，以及能否找出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ies）與普遍通則（Risse, 2000:12）。

建構主義內部相同的是社會事實本體論，差異的是知識論的相對主義差異（莫大華，2002；2003），也就是缺乏知識論的共識，或者是其知識論是多元的。如何從這些知識論差異中建立溝通橋樑遂成為國際關係理論建橋計畫之一，²學者從知識論區分不同類型的建構主義，藉由引入不同的哲學論述與理論及方法企圖為建構主義建立溝通管道與空間，使建構主義更能具有共通的特質與知識論基礎。

本文區分三部份，第一部分簡述國際關係學者基於知識論差異而對建構主義

¹ 學者就依據其研究目的而對於建構主義者進行不同分類標準的歸類，參閱莫大華(2002)；以研究歐整合為例，不同類型的建構主義也會出現不同的主張，參閱 Christiansen, Jorgensen and Wiener (2001)。

² 另外兩個建橋計畫是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立溝通橋樑，以及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建立溝通橋樑，參閱莫大華(2006)。

進行的分類，並建立本文的建構主義知識論分類；第二部分嘗試探索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爭論，尤其嘗試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立中間道路（middle ground, middle way, via media）的主流建構主義，以及其他非主流建構主義（批判詮釋建構主義與激進後現代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第三部分則是探討不同知識論立場的建構主義內部建立中間道路或溝通橋樑的可能性。

壹、建構主義的知識論分類³

建構主義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與附加價值，就在它強調相互主體知識的本體論實體，以及此實體的知識論與方法論意含（Alder, 1997:323-324）。知識論是指研究知識的定義、基礎與有效度，它關注的是我們如何獲得有關社會世界的知識。就知識論提供評斷科學知識的不同基準，知識論可區分為經驗性（或解釋性）的知識論與理性（或詮釋性）的知識論，前者認為科學知識主要是以人類經驗為基礎，去解釋社會世界。即是，人類觀察或其他感官所獲得的證據是建立科學知識的基礎，所有的科學假設都必須是可以此證據驗證的（verifiable）。相對地，後者主張先存的理性（a priori reason）在獲得知識的重要性，人類藉由理性思考而獲得知識，此知識是不限於人類經驗之內，它是以同理心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用以理解與詮釋人類的社會世界，人類知識的功能是在反映物體存在本身，以創造此物體的方式詮釋此認知過程。基本上，客觀的物質主義（objective materialism）的本體論是與經驗論者或解釋式的知識論有關聯，主觀的理念主義（subjective idealism）的本體論則是與理性論者或理解式的知識論有關聯。但不必然如此，兩者亦可交會，這是個偉大的哲學辯論議題，至今仍無定論。⁴在本體論上，建構主義者絕大多數是主張主觀的理念主義的本體論；在知識論上，建構主義學者也多是詮釋、理解式的知識論。但學者的主張仍是有程度差異，甚至有極大的差異。例如，Wendt 是溫和的理念主義，但卻不主張詮釋、理解式的知識論，因為他並不認為理念主義的本體論意含著後實證主義的知識論，而是企圖以科學實在論結合理念本體論與實證主義知識論（Wendt, 1999:39-40）。

要理解建構主義內部的差異，⁵就必須對於建構主義學者的主張進行分類，以不同的分類標準呈現出不同建構主義的差異。其實，對學者進行分類是極不科

³ 本節參考莫大華(2002)。

⁴ 即是哲學界的唯物論與唯心論的爭論。

⁵ 建構主義內部的差異包括了對於 Wendt 建立普遍理論、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關係、建構主義方法論，以及建構主義與批判性國際理論(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之間關係等而有不同主張(Reus-Smit,2001:222-225)。

學的方法，究竟要以學者的什麼著作、多少著作作為分類依據？是否僅能就著作中的幾句話，就把學者歸類呢？學者的著作若是出現多種特質，加上各類別の間區隔並不是那麼分明，要如何歸類呢？尤其是學者在被歸類時，其本人是否也同意這樣的歸類呢？其他學者是否也同意這樣的歸類呢？誠如 Kratochwil (2000:89) 所言：問題不是某人是否說了或相信他是一位建構主義者，而是這樣的指證或自我指證是否符合所界定的建構主義涵義 (tenet)。所以，學者為呈現理論內部脈絡的多元性與豐富性，仍不免根據其研究目的而運用分類方法來呈現學者的理論意涵。因此，為呈現出建構主義學者之間的知識論差異，遂從知識論觀點對建構主義者進行分類，但必須理解建構主義較關注的是「怎會變成這樣」 (how things became what they are) 而不是「怎會這樣」 (how things are) (Adler, 2002:100-101)。⁶例如國家利益、國家認同、國際規範如何變成這樣 (how was it down.) (Weldes, 1996; Hopf, 2002)。

一、Ted Hopf 的分類

Ted Hopf (1998) 以理論的差異與知識論的差異以及源自批判理論的程度，區分傳統的 (conventional) 與批判的 (critical) 建構主義：前者是匯集從批判的社會理論所精煉的原則所構成，但沒有後者在知識論或理論上的一致性。前者在方法論與知識論上，並未運用任何特別詮釋論者的方法論，而採實證論在樣本特性 (sample characteristics)、差異方法 (methods of difference)、過程追蹤 (process tracing) 與檢查真偽 (spuriousness checks) 的傳統，以理解社會實體，並接受最小的基礎論⁷或權變的普遍主義 (contingent universalism)；後者主張不能挑剔 (criticize) 自己的理解界線，並主張反基礎論。他認為傳統的建構主義是在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與批判 (建構主義) 理論之間解釋政治，它既反對前者對世界政治的假設，即是同質的，並可予以理論化而產生普遍有效的通則；也否認後者認為世界政治是異質的而應先假定指尋求獨特性與分殊性。它則是主張應尋求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主體之社群，在此社群中，行為者相互共享對本身的理解，在特定系絡內產生可預測的及重複的行動模式 (Hopf, 1998:171-185, 199-200)。

⁶ Adler(2002: 95-118)

⁷ 即是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問題(question of foundation)，這主要是 Mark Hoffman 和 Nick Rengger 之間的辯論，爭論的焦點是我們是否相信世界能以中立或客觀的程序予以測試或評估，前者認為所有的真理主張皆可判定真偽，後者則認為真理主張是不能判定真偽，因為是不存有客觀的立場來判定。參閱 Hoffman(1987;1988); Rengger(1988); Hoffman and Rengger(1992); Smith(1995); Doucet(1998).

他並未明指此兩類別有那些學者，但從他的引述說明來看，傳統的建構主義學者是 Friedrich V. Kratochwil、Ronald L. Jepperson、Alexander Wendt、Peter J. Katzenstein、David Dessler、Elizabeth Kier、Richard Price、Nina Tannenwald、Martha Finnemore、Robert Herman、Thomas U. Berge、Tzvetan Todorov、Ashis Nandy 等等；批判的建構主義學者則是等同於批判理論的學者，如 Richard Ashley、David Campbell、R. B. J. Walker、Cynthia Weber、James Der Derian、Mark Hoffman、Andrew Linklater、Asturo Escobar、Daniel Deudney、Roxanne Lynn Doty、Jim George 等等。

二、Jeffrey T. Checkel 的分類

Checkel (2004:230-231;2006:4-7) 根據知識論取向、研究方法與理論引用來源區分出傳統建構主義、詮釋 (interpretative) 建構主義與批判 (激進) 建構主義，傳統建構主義的知識論取向是實證主義，強烈提倡建立不同理論觀點之間的溝通橋樑，方法論是質化、過程追蹤的個案研究，理論引用源自制度論與組織理論及社會學，此類學者有 Caporaso、Checkel、Jupille、Derek Beach 及 Jeffrey Lewis。詮釋建構主義是後實證主義的知識論，探索語言在建構社會實體的角色，以及造成變遷的背景條件與語言建構，以歸納法作為研究策略，研究方法則包含各種不同的語言技巧，學者有 Checkel、Thomas Banchoff、David Laitin。批判 (激進) 建構主義除關注語言外，並探究研究者本身在研究中的啟示，強調論述研究法，理論引用源自維根斯坦及歐洲社會理論的語言研究途徑，學者如 Maja Zehfuss、Thomas Diez、Waever、Erik Oddvar Eriksen、John Erik Fossum、Juergen Neyer、Liesbet Hooghe 等。

三、Ralph Pettman 的分類

Ralph Pettman (2000:12-25) 以建構主義學者的「科學推理」(scientific reasoning) 方式分為保守的 (conservative) 建構主義、社會理論的 (social theory) 建構主義與常識的 (commonsense) 建構主義等三類。保守的建構主義者是指尋求為其嚴謹的科學推論作辯護的學者，他們也提倡適應 (adaptation) 與變遷，但這並不意味著要減損此學科運用嚴謹的科學推論。他們長期地嘗試去提供一個以經驗檢驗過 (empirically tested) 的知識累積。保守的建構主義內部還可再區分強硬共組 (hard-line co-constitution) 與溫和的社會建構主義 (soft-line social constructivism) 兩個次類，前者是在面對後現代主義論者挑戰時，明顯地企圖吸納後現代主義觀點。Pettman 並未明指此類學者，而是以行為主體 (agent) 與結構 (structure) 的問題，隱射主張此兩者是建構體 (constructs) 並且是相互共組

的 (co-constitute) 之類的學者。後者則是較為委婉，以社會科學化的方式，尋求擴展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經濟的核心研究到「人」(people)與「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此類學者如 John Ruggie、Peter Katzenstein。

社會理論的建構主義是指尋求形成系統的社會理論，而不是尋求被嚴謹認知的社會科學之學者。他們認為社會科學要能成功，只有以較不嚴謹的方式運作。他們認為世界事物只是社會關係的一種、是社會研究的主題之一，他們並不拒絕理性地運用理性 (rationalistic use of reason) 作為最好的致知方法。將世界客觀化並理性地思考世界，將提供對世界一個有系統的解釋。因此，此派是理性論與現代論之一，在方法論上，它是一種折衷。他們更可能體認到現代性的超越性 (excess of modernity)，他們甚至會是後現代論者，特別是如果他們將真理解釋為是權力問題，以及是論述與紀律 (discourse and discipline) 的函數關係時。他們也並不主張真理必須是永恆的、普遍的與必須的，而是接受某種程度的偶然性 (contingency)。他們並不考量學科之間的界線，而探討社會關係。如果此派成功的話，則保守的建構主義學者就要沒戲唱了 (out of business)。因為它已發展成更為全面的社會理論時，就自然涵蓋了保守的建構主義。因此，後者以邊緣化此派觀點作為回應，他們強調當前的學科界線及學科內部複雜性，並減少讓此派獲得正式的學科討論機會。

此派中最顯著的派別是運用語言分析的學者，他們不僅運用語言作為強調相互構成 (co-constitution) 的運作方法，也作為呈現言語—行動 (speech-act) 的積極性，也就是說言語即行動，因為言語代表了主張、需求及承諾，並尋求去影響他人。Nicholas Onuf 就是此類學者。

常識的建構主義對於理性的運用更不嚴謹，此派強調一般人們對世界事務的理解與感受，使人們回歸到整體的、探知世界的 (world-knowing) 社會自我而超越了理性主義所設定的限制。

四、Alexander Wendt 的分類

Wendt 指出建構主義有三類流派 (stream)，但並未明確指出其分類基準，只說國際關係理論中現代論者與後現代論者之間的知識論辯論，⁸促使此辯論發生的實際議題，也使得建構主義者分成現代論建構主義與後現代論建構主義，兩者都對知識豐富的實踐如何構成主體感興趣，也認為認同體與利益是互動的內在因素，此過程是認知的與相互主體的概念過程。他 (1992:393-394; 1999:3-4) 將

⁸ 根據 Wendt (1992:393-394)的說法，即是第三次大辯論。

Ruggie 和 Kratochwil 歸類為現代論建構主義，Ashley 和 Walker 則歸類為後現代論建構主義，Spike Peterson 和 Ann Tickner 歸類為女性主義論者建構主義。他們共同的門檻是世界政治的行為者是被社會地建構而來的（Wendt, 1992:393-394;1999:3-4）。他本人則是現代論建構主義（Wendt, 1999:47）。他對強調「理念一路到底」（ideas all the way down）的建構主義稱之為激進的建構主義，並在論述中相對照出所謂薄弱的（thin）建構主義與厚實的（thick）建構主義，即是強調理念的厚薄程度（Wendt, 1999: 1-2,81,131,132,136）。就 Wendt 的說法，可以看出他是屬於激進建構主義，但也不是非常激進。⁹

五、John G. Ruggie 的分類

Ruggie (1998:,1999:240-242) 則以建構主義者的哲學基礎及此基礎與社會科學的可能性作為分類基準，即是對社會科學的詮釋角度分類，分為新古典（neo-classical）建構主義、後現代論建構主義與自然主義（naturalistic）建構主義等三類。新古典建構主義的知識論是實用主義（pragmatism），藉由言語行動理論、溝通行動理論、演進式知識論作為分析相互主體意義的工具，並承諾社會科學的理念。他將自己及 Ernst Haas、Peter Haas、Kratochwil、Onuf、Emanuel Adler、Finnemore、Katzenstein、Jean Elshtain 歸為此類。後現代論建構主義的知識論根源是來自 Friedrich Nietzsche、Michel Foucault 及 Jacques Derrida，其強調主體的語言建構、論述實踐）構成本體論的本源（primitives）或實體及分析的根本單位（units）；認為正統的（legitimate）社會科學是希望渺茫，而是以霸權論述（hegemonic discourse）的強制力量（disciplinary power）強加一個「真理的典則」（regime of truth），其因果性也是妄想。他列出 Richard Ashley、Campbell、Der Derian、R. B. J. Walker、Spike Peterson 是此類的學者。自然主義建構主義的知識論哲學基礎位於前兩類之間，並混合兩類的觀點。它與新古典的建構主義一樣接受主流的理論化特質，但卻是立基於科學實在論的哲學準則。它企圖建立一個「自然科學式的社會科學」（naturalistic social science），因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本體論並無多大差異，對物質世界與社會世界的科學研究，多屬非可觀察的。他列出 Wendt 和 David Dessler 是屬於此類。

⁹ 他這麼說著：不像一位可能更激進的建構主義者立場，我並不否認這些(非物質)力量的獨立解釋力，但我的確認為他們是較不重要的和較不感興趣的，反而是人們建構這些力量的意義系絡(Wendt, 1999:136)。

六、Richard Price 和 Christian Reus-Smit 的分類

Price 和 Reus-Smit (1998: 267-270) 為說明建構主義能補強批判國際理論 (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在概念精緻化及經驗性研究的弱點。就以批判國際理論的現代論與後現代論的知識論區別，將建構主義也分成現代論與後現代論兩類，前者集中於世界政治主客體的社會語言建構，後者則是焦點於權力與知識的關係；前者又分系統的 (systemic) 建構主義與整體的 (holistic) 建構主義，系統的建構主義是接受新現實主義的系統理論，其結構過程的概念較狹窄，國家與國際體系概念是靜態的，並未指出行為主體與結構變遷的過程，此類是種互動形式的建構主義，像是種社會撞球理論 (a social billiard ball theory) 並以 Wendt 為代表；整體的建構主義則是以更廣泛觀點整合國內和國際現象，重視國際變遷的動態，焦點於國內與國際現象互動，如何決定組成國際秩序的規則，既可解釋國際體系又可解釋國際體系的變遷，此類以 Kratochwil 和 Ruggie 為代表。後現代建構主義也關切世界政治主客體的社會語言建構或論述建構，它更集中於語言、意義與社會權力互動的社會歷史條件，特別是知識主宰形式的建構及其在當代生活的訓誡與再呈現。此類學者有 Roxanne Lynn Doty、Karen Litfin、Price、Janice Thomson、Cynthia Weber。¹⁰

七、David Campbell 的分類

Campbell (1996; 1998) 為說明其本身的後結構論觀點，是不同於建構主義而從建構主義內部區分出具批判傾向的 (critically inclined) 建構主義學者，他稱為批判建構主義者、社會建構主義者或批判社會建構主義者，如 Barry Buzan、Ole Waever、Jutta Weldes、Mark Laffey 及 Wendt。他為釐清普遍以建構主義包含後結構主義與批判的建構主義之趨勢，遂特別強調後結構主義與批判建構主義的差異。他認為後結構主義重視認同體的運作構成 (performative constitute) 而不僅是相互構成；在本體論上關注理念主義與物質主義的運作性 (performativity) 而非二分法。它承認認同體的解構既擴大政治的領域 (domain of the political) 以納入認同體被建構的方法，並包括正面肯定現有認同體形成的改變，及認同體的替代性累積，以及政治的可能性。批判的建構主義則是猶豫地主張這樣激進的邏輯，而是強調以確保認同體的某些面向，作為支持分析的方法；並複製某些主流

¹⁰ Reus-Smit(1999:165-168)在後來著作中，將 Price 和 Thomson 列為整體的建構主義學者。

理論的觀點（1998: 217-227, 287）。

從這些學者的分類中（摘要如下表），我們可以發現學者對於建構主義學者的知識論認知有所不同，而有不同的分類基準，建構主義學者也就被歸類於不同的類別之內。被歸類的學者本身並不一定就同意此分類，例如 Wendt（1999: 313-369）同意他是現代論的建構主義學者，但認為其建構主義能解釋結構變遷與過程。分類只是存在於研究者的分析架構之內，受到其他多數學者（包括被分類的學者）所接受的分類是好的分類，所謂好就在於它有效地指出異同，使讀者能理解學者在此分類架構內的立場，以明白分類學者的研究旨趣。此外，從學者的分類分析中，也可以發現建構主義學者之間內部知識論與方法論的爭論，乃至其他學者對於建構主義的批評。但也誠如 Emanuel Adler（2002:96）所言，國際關係研究的建構主義學者未能釐清建構主義在形而上學、社會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等三層次的差異，而遭致外界的誤解與混淆。

從這些學者分類中，可以發現學者對於建構主義知識論的分類趨向以實證主義知識論與後實證主義知識論為分類，前者以自然科學實證主義為知識論基礎，嘗試對於國際關係進行「科學研究」探索其因果關係的解釋；後者則是以後實證論（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知識論進行組成關係的理解。也正因為如此，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爭論是實證主義知識論與後實證主義知識論之間的爭論，焦點即在於兩者之中何者較相能相容於建構主義的社會本體論？乃至建構主義能否藉由實證主義知識論而成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即是 Wendt 以科學實在論建立的中間道路建構主義所引發的爭論。

就知識論而言，主流理論的中間道路建構主義主張真實世界獨立存在於人類心智之外，並主張最小基礎主義（minimal foundationalism）（即是知識的背後存在著絕對客觀、確定性的基礎在支撐知識，可以藉由特定的知識論途徑接近真理，但並不是絕對地）認為可以藉由科學實在論綜合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而成為兩者之間的中間道路。批判（詮釋）建構主義則是主張反實在論與反基礎主義的知識論立場（即知識的背後並沒有絕對客觀、確定性的基礎在支撐知識，無法藉由特定的知識論途徑接近真理），認為真實世界存在於人類心智，而且必須藉由人類心智予以詮釋，尤其是語言論述的詮釋方法。有些批判（詮釋）建構主義學者（如 Onuf、Kratowil）並不熱衷於建立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有些則是致力於此中間道路（例如 Schimmelfennig、Hopf、Guzzini），也因此有時被歸類為建構主義主流理論，但仍不及 Wendt 與 Checkel 所強調的科學實在

表一 學者對建構主義知識論差異的分類摘要表

作者	分類標準	類別	主	張學	者
Hopf	知識論差異與批判理論程度	傳統	知識論不一致、實證論方法、最小基礎論、重視認同體、中性分析權力、社會實踐重製權力關係	Kratochwil, Jepperson, Wendt, Katzenstein, Dessler, Kier, Price, Tannenwald, Finnemore, Herman, Berge, Todorov, Nandy	
		批判	知識論一致、詮釋論方法、反基礎論、推翻認同體、解放權力關係	Ashley, Campbell, Walker, Weber, Der Derian, Hoffman, Linklater, Escobar, Deudney, Doty, Gerge	
Checkel	知識論取向、研究方法與理論引用來源	傳統	實證主義知識論、質化、過程追蹤的個案研究、社會學	Sikkink, Barnett, Finnemore, Wendt	
		詮釋	後實證主義知識論、語言分析與研究、各種不同的語言技巧。	Hopf, Price, Reus-Smit, Neumann,	
		批判	後實證主義知識論、語言分析、研究者本身在研究中的啟示、論述研究方法、維根斯坦及歐洲社會理論的語言研究途徑	Zehfuss, Diez, Waever, Eriksen, Fossum, Neyer, Hooghe	
Pettman	科學推理方式	保守	嚴謹的科學推理	Ruggie, Katzenstein	
		社會理論	系統的社會理論	Onuf	
		常識	強調人的理解與感受		
Wendt	知識論差異	現代論	實證主義知識論	Ruggie, Kratochwil	
		後現代論	後實證主義知識論	Ashey, Walker	
		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知識論	Peterson, Tickner	
Ruggie	哲學基礎與社會科學可能性	新古典	實用主義、承諾社會科學	Hass, Kratochwil, Onuf, Adler, Finnemore, Katzenstein, Elshain	
		後現代論	後現代論、社會科學不可能成為科學	Ashley, Campbell, Der Derian, Walker, Peterson	
		自然主義	科學實在論、自然科學式的社會科學	Wendt, Dessler	
Price and Reus-Smit	批判理論的知識論	現代論	主客體的社會語言建構，又分系統與整體兩類，前者接受新現實主義，未指出變遷過程；後者重視動態變遷	系統：Wendt 整體：Kratochwil, Ruggie	
		後現代論	權力與知識關係	Doty, Litfin, Price, Thomson, Weber.	
Campbell	認同體的運作性與構成	後結構論	認同體的運作構成、肯定認同體變遷與替代性、政治可能性	Campbell	
		批判	認同體的相互構成、確保認同體某些面向、複製主流理論觀點	Buzan, Waever, Weldes, Laffey, Wendt	

資料來源：修改自莫大華（2002）

論立場。激進（後現代）建構主義（例如 Campbell、Ashley）¹¹也是反實在論與反基礎主義的知識論立場，強調一切都是理念的作用，雖然也強調語言論述方法，但更重視語言論述中的權力宰制關係，這些非主流建構主義則是盛行於歐洲學界，可稱之為建構主義的歐洲學派。

表二 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主張差異表

類 型 項 目	現 代（傳 統） 建 構 主 義	詮 釋（批 判） 建 構 主 義	激 進（後 現 代） 建 構 主 義
知識論立場	社會實體是主觀的，但仍能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追求因果解釋的科學知識。	社會實體是相互主觀的，只能藉由詮釋方法，追求解釋性的理解。	社會實體是完全主觀的意識理念活動，科學知識不存在，只能理解。
	最小基礎主義	反基礎主義	反基礎主義
哲學理論依據	實證論 科學實在論	詮釋理論 批判理論	後現代主義 後結構主義
中間道路	有	可有可無	無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貳、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爭論

建構主義不僅與主流理論理性主義爭論，建構主義內部的爭論與批評也是非常激烈的（Jacobsen, 2003; Ruggie, 1998），¹²主要是集中在批評以建立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中間道路的傳統建構主義或現代建構主義，其代表學者如 Adler、Wendt、Checkel，他們嘗試結合相互主觀本體論與客觀實證知識論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立中間道路或溝通橋樑（Adler, 1997; Checkel, 1998:327; Wendt, 1999:40），由於此企圖使其藉由批判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現實主義）而成為建構主義內部的主流理論。另有詮釋（批判）建構主義學者則是企圖結合社會本體論與詮釋後實證知識論建立中間道路或地面（Schimmelfennig, 2001; Hopf, 2002; Guzzini, 2000），乃至激進（後現代）建構主義質疑或反對建立中間地面

¹¹ 本文指涉的激進(後現代)建構主義即是有些學者(Adler, 2002)所稱的批判建構主義，兩者共同的特質在其強調解放既有的結構限制。

¹² Ruggie(1998:242)曾引述 Mark Neufield 的觀點，說明建構主義陣營內部的爭辯與受到實證論者批評是一樣充滿活力的，他並以 Campbell 對他及 Wendt 的評論，作為例子說明這樣的情況。參閱 Ruggie(1999)。

(Ashley,1988,1989; Campbell,1998)。¹³這些非主流建構主義學者與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理性主義)的差異則是除了本體論外,還有知識論的差異;而與前述主流建構主義學者,也是存有知識論的差異。也就是不僅是非主流建構主義批評主流建構主義,主流派內部與非主流內部亦復相互批評。換言之,建構主義是沒有共同的知識論基礎,而使得建構主義學者成為陌生夥伴(strange bedfellows)(Marcel, 2001),所謂「知識論焦慮是為陌生夥伴而來(Epistemological anxiety makes for strange bedfellows.)」(Wendt, 1999:49)。遂有建構主義學者提議內部的知識論對話與綜合,尋求相互補充的知識論立場與多元。

一、主流理論—建立中間道路的現代建構主義

有些建構主義學者企圖結合社會本體論與實證主義知識論以取得(seizing)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中間道路(Adler, 1997)或是建立(establishing)中間道路(Christiansen et al., 1999, 2001)或是建立橋樑(Wendt,1992;1999)為主要的理論訴求,他們與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理性主義)的差異是在本體論,而與建構主義本身的差異則是在知識論上,尤其是上述建立中間道路的可能性。這些建構主義學者主要是美國學者,他們藉由發表著作與教學而掌握國際關係研究學界,而成為主流的建構主義學派,也就被稱為是建構主義的美國學派(American variant)或現代建構主義。

(一) Adler 的中間道路建構主義

Adler (1997:321-323)認為建構主義是嘗試在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與詮釋主義之間建立溝通橋樑,它是理性主義與相對(詮釋)主義之間真正的中間地面,因為在本體論上它立基於物質主義與理念主義、個別的行為主體與社會結構的雙交會口,以在知識論上相互主觀(詮釋)的意涵,它在科學哲學上是實用主義。他以集體理解的認知演化(cognitive evolution)理論詮釋社會真實,認知演化是指社會世界建立社會事實的方式,與社會事實運用影響力的方式有關,因此,歷史過程中的任何一個時空,社會事實是由物質世界與社會世界的集體理解所社會建構的(Adler,1997:337-339)。認知演化理論是一個國際學習的理論,能使建構主義以經驗研究為取向,他希望建構主義能重新發現如何將理性考量帶入集體的人類事務上(Adler,1997:339-348)。

¹³ 也可用後結構主義者或解構主義者稱述(Oga,2003)。

對於建構主義內部分歧的問題，Adler 認為務實的實在論提供了鞏固建構主義內部共同基礎的一個方法（2002:28），建構主義內應該建立一致的方法論，並減緩其知識論與本體論的爭論而集中於建立實質理論，加強發展其細部的基礎（micro-foundations），¹⁴，重視建構主義的實踐結果與政治結果，強調科際整合研究（Adler,2002:109-111）。

（二）Wendt 的中間道路建構主義

Wendt (1992:) 藉由發展建構主義而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立溝通橋樑，他以科學實在論作為建構主義的哲學基礎，引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新論辯。科學實在論是一種科學哲學，其假定世界（即客觀世界）獨立存在於人類之外，成熟的科學理論指涉此世界，即使科學對象是不可觀察的，亦復如此。理論反映真實，而不是真實反映理論，本體論先於知識論（Wendt,1999:47）。Wendt 的建構主義是在主觀的理念主義本體論上，強調科學多元化的實證主義知識論，並且理解式的知識論也是有其重要角色。他一方面以限定建構主義是本體論而非知識論的方式來封住後實證論者的批評，另一方面運用科學實在論來封住（block）經驗論者以可觀察的作為本體論之主張。他認為因果問題與構成（constitutive）問題都有助理解國際政治內的理念與社會結構（1999:39-41）。也就是說，在知識論上，他認為不可觀察的實體與因果機制可藉由科學理論而存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沒有不同，科學解釋也可運用在社會科學（1992:35;1999:1,39,77,374,378;Shapiro and Wendt, 1992:210）。簡言之，他認為社會實體客觀獨立於思想與個別觀察者的語言之外，但仍可運用科學理論予以解釋，即使是不能直接觀察。科學有助於我們理論性的理解與外在世界的深層結構相一致（Wendt,1999:51-76）。

後來他引用量子意識理論說明，理念也是可以進行科學研究（Wendt, 2006）。他並引用社會學的結構化理論與社會互動理論解釋社會實體建構的過程，強調相互主觀意義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認為解釋與理解之間並無知識論的差異，但因果性的理論化與構成性的理論化之間則有方法論的差異，這反映出兩者所要回答的問題差異（Wendt,1999:85-88）。Wendt 更企圖從物理的量子力學觀點——量子意識假設（quantum consciousness hypothesis）為其所引發的批評與討論提出辯護，並以波與粒子雙元性關係（wave-particle duality）、波函數崩陷（wave function collapse）、測量問題（the measurement problem），以及非局

¹⁴ 例如理解個體與社會結構之間關係及過程的社會機制(social mechanism)。

部性 (non-locality) 說明社會科學探索的身心 (mind-body) 問題，即是社會科學的本體論與知識論觀點，而成為一個量子社會科學 (或社會物理學)，以此主張其科學實在論的觀點 (Ibid,189-205)。也就是說，他是科學一元論的知識論觀點，認為主張國際研究應重視本體論的爭論而非知識論的爭論，後者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本體論是重於知識論，國際研究的主流理論 (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 與建構主義所差異的是本體論而非知識論。但就建構主義而言，Wendt 所忽視的知識論爭論則就顯得更有意義了。

(三) Checkel 的中間道路建構主義

Checkel (2001c:554) 自稱是現代論建構主義者，喜好鬆散的因果知識論，但挑剔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同樣是主張建立中間道路，但不同於 Wendt 的主張，Checkel 則是更為關切知識論的議題，尤其是建構主義內部應關切此議題，因為傳統建構主義 (包括 Wendt) 認為大家都是實證主義者為什麼要討論知識論，以及受到 Wendt 主張本體論優於知識論的影響，而造成其缺乏關注知識論問題而嚴重限制其建橋計畫 (Checkel, 2006:9-12)。就知識論而言，他認為無論是何種類型的建構主義都能從其他相對類型的建構主義獲得協助，傳統建構主義運用詮釋建構主義的論述研究法，詮釋建構主義則是運用了傳統建構主義的過程追蹤法，皆可以科學實在論、分析折衷主義、實用主義與傳統主義達成混合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方法的目的。而且，隨著建構主義學者逐漸關注研究方法，建構主義之間的方法論爭論未來將超越知識論爭論 (Checkel, 2006:14)。他嘗試以過程追蹤的研究方法與科學實在論作為建構主義內部知識論基礎，科學實在論可以作為過程追蹤法的概念基礎，以及統一建構主義之間知識論差異的廣大平台，並且提供一個哲學與知識論的中間道路充實美式實證主義與歐式後結構主義之間廣大的方法論空間 (2005 Checkel, 2006:13-14)。

簡言之，Checkel (2006:29-30) 認為由於建構主義學界並沒有知識論與方法的共通標準，應在建構主義內部建起溝通橋樑，以概念多元主義及後設理論多元主義鼓勵對話與相互學習，則建構主義就能一致了。¹⁵

在知識論上，Adler、Wendt 與 Checkel 都主張建立中間道路，但 Checkel 不僅重視建構主義與主流理論之間的中間道路，也關注建構主義內部知識論的中間

¹⁵ Checkel(2006:30)原文是指歐洲建構主義學者教導其學科同行一些新技巧，假以十年後，則溝通橋樑的努力就能反敗為勝。而且，如果建構主義學者前的形容詞「歐盟」消失，則就會是成功的最後訊號。

道路。

二、非主流理論—批判（詮釋）建構主義與激進（後現代）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內部另有不以科學實在論為科學哲學基礎的非主流學者，他們主要是以詮釋理論、批判理論、後結構理論、後現代理論為基礎，可概略地區分為詮釋（批判）與激進（後現代）兩支。這些非主流學者對於嘗試建立中間道路的主流理論抱持著不同的態度，有的反對有的贊成，更使建構主義內部的分歧與爭議更加複雜。尤其是激進建構主義是屬於建構主義或反思主義？就知識論而言，激進建構主義或後現代建構主義是較為接近反思主義，因為激進建構主義的社會本體論與知識論過於強調理念因素，其方法論只以論述分析為研究方法，它是「理念一路到底」的建構主義（Wendt, 1999; Checkel, 2004）；有的學者則認為激進建構主義應視為是反思主義，因為激進建構主義已經與建構主義完全分離了（Adler, 1997; Checkel, 1998）；但也有些學者則嘗試提議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進行匯合，企圖藉由建構主義重新反思後現代主義的觀點。Price 和 Reus-Smit（1998:267-270）為說明建構主義能補強批判的國際理論（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在概念精緻化及經驗性研究的弱點。就以批判國際理論的現代論與後現代論的知識論區別，將建構主義也分成現代論與後現代論兩類。有些建構主義學者（Pettman, 2000: 12-25）在面對後現代主義論者挑戰時，也明顯地企圖吸納（co-opting）後現代主義。即使是「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學者 Robert Jackson（1996:213）也主張以反基礎論的後現代理論建立批判的國際社會理論。有些學者甚至將 Ashly 和 Walker 歸類為後現代論者（postmodernist）的建構主義（Wendt, 1992a: 393-394, 1999: 3-4; Ruggie, 1998b: 240-242）。然而，後現代主義重組現代主義理解的基本問題，其所強調的不在主體（即作者/獨立國家）或是客體（即獨立世界/文本），而是在建構出主體與客體（和理論與實踐、事實與價值）的歷史、文化與語言的實踐（George, 1994:192），這也是建構主義所缺乏的特質，將之引入建構主義有助於豐富建構主義的主張，但也增添更多的分歧與爭論。

（一）詮釋建構主義—Onuf 與 Kratochwil

Onuf（1989:35-65）以哲學立場專論建構主義，並以 Wittgenstein 對規則的觀點論述建構主義，自稱本身是與結構化理論相關。就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duality of mind and matter）而言，他認為建構主義的哲學立場，授與多元的各種世界一個存在的立場（existential standing），我們在一個我們不知道的（真

實)世界中,建構我們所知道的各種世界。人類是語言的使用者,是唯一與神接近的;人類的認知活動被推至理性,人類心智發現或創造了世界秩序。建構主義的科學哲學立場,認為科學所知的世界,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社會建構。研究方法雖是依賴理論的(theory-dependent),是人類心智所製造的,但理論、方法與數據都不是僅建構在人類心智中,或僅由人類心智所構成。它並不否認現象的存在,而是認知到觀察的限制(1989:36-39)。他指出其所喜好的建構主義,是不嚴格區分物質世界與社會實體,兩者是不定地相互影響(contaminate);也不以界定另一者的不存在,而授與一者統治權;它並不是在否定個體作為由物質設定的生物(beings),其獨立的與自然的實體之下,而發現個體內或是為個體,所被社會地製造而成的主要內容。人類與社會相互建構,並不意含著完全來自人類心智(1989:40)。他也認為建構主義者對於推理的詮釋是擴展至學習與致知(learning and knowing),即是知道如何運用知識,包括有關規則的知識(1989:97)。

Kratochwil(1989:21)認為知識論影響到對於人類行動的理解。他引亞里斯多德的觀點,認為人類世界是人為產物(artifice)之一,語言強化人類的溝通能力,也使人類免除時空限制,以及相互學習。況且,人類具有理性論說的力量(the power of reasoned speech),使人能對政治有共同觀點。人類行動是被規則所管轄的(rule-governed)、是種行動語言(action words),經由人類理性推理過程(reasoning process)共同規制(regulate)與構成社會實踐(決策)。人類社會契約論的相互承諾,其效度在於人類規範所建立的制度,國際領域與國內領域的行為者都必須訴諸於(resort to)規範。在此過程中,務實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既處理行動的議題,也探究論述的形式特質,以超越工具(instrumental)理性的手段與目的的關聯(1989:1-12)。他認為社會世界的因果性是來自有意義的行動,其解釋是要精練(elaborating)行動、驗證(justifying)行動,可能的話要執行(excusing)行動,而不是否認(refuting)假設(1989:24-25)。因此,他利用語言分析理論理解規則與規範影響人類決策的過程,而非解釋為什麼規則與規範影響人類的決策。但他知道我們無法論及事物本身(things in themselves),只能描述(description)而且描述是不中立且有點主觀的,但涵括了一切的社會實踐與利益而使事物為人所稱喚或所參照(makes the things into what they are called or referred to)(Kratochwil,2000:95)。

Onuf 和 Kratochwil 堅持後實證論的知識論立場,認為科學理論是無法解釋社會實體,而是必須以相互主觀的詮釋才能獲得知識。遂有學者嘗試從後實證的詮釋理論觀點以理論綜合的方式,建立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或溝通橋樑。

(二) 中間道路詮釋建構主義－Schimmelfennig、Hopf、Guzzini

雖然不同於建構主義主流理論以科學實在論為建立中間道路的知識論基礎，仍有些學者嘗試結合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詮釋主義與批判理論）的知識論而建立其中間道路，作為綜合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方法。

Schimmelfennig (2000, 2001, 2003a, 2003b, 2005) 引用 Habermas 批判理論的「論證行動」(rhetorical action) 結合實證主義的理性決策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¹⁶ 提出社群環境內的策略行動 (strategic action in a community environment) 或國際社群下的策略行動 (strategic action in a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即是在集體決策中，最有力的行為者是策略地運用以社群及規範為取向的論證，掩蓋其自我利益與磋商力量而能輕易地使對方放棄與順服。藉此呈現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是有對話及綜合的可能性。

Hopf (2002) 嘗試在不同知識論基礎的建構主義上建立溝通橋樑，他混合運用後實證主義（詮釋論）與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例如前者的民俗學、論述文本分析法，以及後者的統計、實驗與行為主體模擬 (agential modeling)，探索蘇聯國家認同體的建構形成過程與變遷，藉以說明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融合。

Guzzini (2000) 是從觀察層次、行動層次與此二層次之間，以重建一致的建構主義後設理論立場，作為建構主義之間溝通的基礎。就觀察層次而言，建構主義意含著建構主義知識論與雙重詮釋學，在知識論上，它是有關於知識的社會建構；在本體論上，它是有關於社會世界的（社會）建構。就行動層次而言，它假定了相互主體的分析單位。

(三) 激進建構主義－Ashley、Campbell 及 George

對後現代主義而言，現代建構主義是結合實證主義的自由主義而已，並緊密地連結理性主義的理論觀點，後現代主義根本不是建構主義 (Adler, 2002: 107)，¹⁷ Campbell 和 George 曾經責難某些建構主義學者是帶著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異

¹⁶ Nicholson (1996: 139) 指出：理性決策理論一般是實證主義方式 (mode) 或是確定地使用實證主義方法論 (或技術)。

¹⁷ Adler (2002: 107) 是以知識利益 (cognitive interest) 區分建構主義為現代建構主義與批判建構主義兩類，前者認為解釋社會實體是社會知識的主要目標，後者則認為社會知識的主要目標是從被壓迫結構中解放。因此，前者理論是產生有系統知識的工具，合法化了既有現狀，後者則認為理論是解放的工具，對於社會改革提出規範與倫理立場。

端邪說的說謊者（Price and Reus-Smit,1998: 270; Campbell,1996:13; George,1994:15）。但就建構主義是研究人類意識或社會關係的方法而言（Onuf,1998:58-63; Checkel,1998:325-326），或是其探究集體結構而言，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皆屬於激進建構主義，其強調現代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呈現、詮釋與論述，其主張的詮釋是激進詮釋而詮釋建構主義的詮釋是批判詮釋。¹⁸激進建構主義引用後現代論與後結構論的研究方法，例如雙重閱讀（double reading）、系譜學（genealogies）、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等詮釋國際關係。

Ashley（1988）運用 Derrida 的雙重閱讀方法解構了主流理論有關國際體系無政府的結構，藉以說明社會實體的存在並不是客觀存在於外的。國際政治與現代國家已經依據全球的地緣位置建構了國界的論述，必須藉由系譜學詮釋其中的論述及權力關係，以及關注歷史結構藉由實踐而產生、分化、修正與轉型的過程（Ashley,1987）。

基本上，Campbell（1999）是反對知識論的，也無意建立其知識論。因為一個相同事件是能以各種非常不同的方式與明顯差異的各種影響呈現，一切都在敘述化真實（narrativizing of reality）而已（1998a:33-4）。他關注的是國際政治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問題，遂反對主流理論內含的知識實在論，並主張必須藉由相互主體的論述才能知道客觀世界的存在（1998a:24-25; 1998b: 4）。他（1998b）以後現代（後結構）論批判主流理論實證主義的主張，甚至釐清後結構論與批判建構主義（或批判傾向的建構主義）的差別，以理解兩者在回應主流「轉用」（appropriations）理論的差異，¹⁹前者認為認同體的解構既擴展了政治的領域至包括認同體被組成的方式，也限定了認同體必須經由既有的認同體形成予以認可；後者則僅是確保認同體的某些面向作為支撐分析的方法；後者複製了其所要遠離的主流轉用理論元素（1998b: 223-225）。批判理論要以務實的政治條件實踐理論，後結構主義則認為理論即是實踐，並關切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George and Campbell,1990: 280-281）。

George（1994:24）認為這世界一直是一個被詮釋的事物，並一直是以不同且衝突的程度條件詮釋，因此沒有共同可觀察的或檢試的資料可供證明一個中立、客觀知識的世界，也就沒有與真實本身相關聯的最終知識。也沒有單一、根本的歷史而是許多歷史之間的鬥爭，也就是各種論述實踐之間的鬥爭（1994:31）。

¹⁸ 有關批判詮釋與激進詮釋的差別，參閱 Hoffman(1994:70-71)，Reus-Smit(2001:214)。

¹⁹ 「轉用」是後現代主義理論的一種概念，指涉的是習取其他的文化、理論、文本等等而擷取適合的元素轉為新的理論。Campbell 用此詞指的是主流理論(現實主義)歷經多次轉用其他理論而成為主流理論。

根據 Price 和 Reus-Smit 的看法，Campbell 在經驗性研究著作的詮釋立場與大多數的建構主義者並沒有差別（1998:273）；而且藉由理論即是實踐（後現代主義的主張），建構主義者就會深刻地忙於成為帶動變遷的行為主體（agents of change）（1998:283）。

三、建構主義建立中間道路的爭論

同樣是主張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立中間道路在建構主義學者，卻由於彼此的知識論差異而產生爭論，傳統（現代）建構主義認為藉由科學實在論能建立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詮釋（批判）建構主義則由於不同的基礎主義觀點而有的學者認為中間道路是沒有可能的，有的學者則認為是沒有可能的；激進（後現代）建構主義則認為是根本不可能的。

Kratochwil（2000,2006）質疑 Wendt 對科學實在論的解釋是否適當，以及質疑 Wendt 的科學實在論能否作為建構主義的後設理論取向，批評 Wendt 以科學實在論連結建構主義，他認為這兩者是不相容的，而且 Wendt 是用大多數科學實在論者早已丟棄的科學概念堆砌，這是一個失敗的「婚姻」。更以塗鴉（scrabble）遊戲作為隱喻通則化知識與建構主義挑戰的困境，認為是不需要中間道路（middle ground or *via media*），也是不需要新的正統理論。知識論與本體論並不是相互獨立，但藉由論述的語言（概念）結構而緊密連結，知識（knowledge）不應只有一個致知（knowing）方法，尤其因為即使在科學內仍存有許多不同的依據，因此不能歸併成只有一個（科學實在論）基準（Kratochwil, 2000:73）。

Guzzini 和 Leander（2006:73）批評 Wendt 將國際政治理論予以綜合的企圖，認為他只是一位收藏家（gatherer）並非獵人（hunter），是在一個他自己的國際關係社會理論內抽象、重新裝配與同化明顯敵對的理論立場。他這樣的綜合是需要克服與保持既有的矛盾，像是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牛頓物理學的情況一樣，但 Wendt 不甘如此，而是運用粒子（particles）與波的雙元互補性，即是光有時像粒子運動，有時像波運動。他攻擊的標的（target）是以物質主義與個體主義為基礎的國際關係理論正統，但他卻是有意留在此學科的正統內，論證其理論異端（2006:74-78）。即是選擇理論正統的國家主義（statism），以及以傳統的國家社會（society of states）界定國際政治，這樣的綜合則是與其所主張的實證主義無關（2006:78-88）。

Campbell（1998b:219）批評建構主義最嚴重也最負面的後果之一，就是誤將建構主義視為是哲學的唯心主義，認為如果決策不同則世界就會自動不同。另依各負面後果是假定了有意圖的行為主體可以使事物貧困，即使事物概念是由社

會建構而來的。他進一步批評 Wendt 有關科學哲學不是國際關係理論，應避免討論本體論問題的主張，認為 Wendt 的知識實在論造成他在知識論的自滿 (epistemic conceit) (1998b:219-221)。²⁰

Wendt 將科學實在論等同於自然主義，但科學實在論並不都是基於自然主義的前提，自然主義也無法將社會世界概念化，因為社會世界是個雙重詮釋的世界，一個由理念或語言所構成的相互主觀世界，這是 Wendt 建構主義的致命缺失 (Lechner,2006:9-14)。科學實在論者並不能作為建構主義者理論化的概念平台，因為它在自然世界的概念優勢轉移至社會世界時，反而變成劣勢 (Lechner,2006)。

從上述有關主流建構主義內部與非主流建構主義對建立中間道路的批評，即可發現建構主義內部的分歧，主要是集中於不同意 Wendt 以科學實在論作為建立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的橋樑論述依據，而是認為各式各樣建構主義的區隔在於有關科學觀察的反思程度 (Albert, 2001:106)，或是在哲學、後設理論、理論化及經驗研究等層次上有所差異，必須藉以釐清對建構主義的混淆及內部的差異 (Jorgensen,2001:36-53)，即是在知識論深淵建起溝通橋樑 (Wiener,2003:252)。Alberts and Munster (2004) 則認為主流建構主義的中間道路或建橋計畫是有其內在矛盾與困難，包括其社會本體論與實證主義知識論的矛盾、理論與真實世界的連結，並未如其所承諾地完成理論綜合，而應是溝通空間內的理論對話。

參、建構主義內部的建橋計畫與反思

Christiansen 等人在 1999 年第 6 卷第 4 期的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就建構主義與歐洲整合理論擔任專輯編輯，匯集歐美學者探討中間道路建構主義在歐洲整合理論的運用，後來此專輯也增修出版 (Christiansen et al., 2001)。²¹ 他們嘗試混合實證主義的知識論立場與相互主體的本體論 (Christiansen et al.,1999:534)，作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由於各學者的知識論立場不同 (從實證理性主義知識論至後實證反思主義知識論)，他們以半圓形的拱形線代表著建構主義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兩極之間的溝通橋樑作用，拱形線上的各點則是代表建構主義內部不同知識論立場的建構主義，遂在此溝通的拱橋

²⁰ 有關 Wendt 與 Campbell 的差異觀點，參閱 Oga(2003)。

²¹ 主要是增加理性主義學者 Moravcsik(1999)與反思主義學者 Smith(1999)在後一期所提出批評，以及 Risse and Wiener(1999)的答覆。

上形成不同的中間道路建構主義。

然而，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對話與綜合，除了建立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中間道路的可能性外，其本身也是需要尋求建立中間道路或溝通橋樑，因為這些不同知識論立場的差異影響著建構主義的能否發展成為具有實質性質的國際關係理論。不論如何，學者遂紛紛引用其他學科理論或觀點，嘗試整合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差異。例如嘗試以社會學的「架構（框架）理論」（frame theory）與 Jurgen 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s）提議內部的溝通（Haacke, 2005; Weber, 2005; Wiener, 2001）；或以「詮釋學」（Hermeneutics）作為解決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不一致，以及實證主義在（實體）構成與解釋的問題，還有後現代主義的主觀主義問題；以「雙重詮釋學」（Double Hermeneutics）區分建構主義內部不同的觀察層次、適當的行動層次與此二層次之間的關係，藉以重建建構主義為反思的後設理論而避免其在理論上的折衷與多餘（Marcel, 2000:147-182）。也有建構主義學者引用 Pierre Bourdieu 的實踐哲學、²²Niklas Luhman 的知識溝通理論，²³Georg Simmel 的「社會互動理論」（sociation theory）作為建構主義內部溝通的知識論「中間道路」，因為此理論可以避免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侷限於行為者的社會角色，探索行為者的整體（corporate）認同體。²⁴Valerie Marcel 認為詮釋學（Hermeneutics）的知識論可以調節大多數建構主義的知識論差異，因為它既是整體論而又能概念化行為主體，它也是系絡的，能調節現代論與後現代論建構主義之間的知識論差異（Marcel, 2001）。

總而言之，建構主義學者是從社會學與哲學尋求其內部知識論的溝通橋樑，此建橋計畫仍是處於未定之天，但是其內部的知識論差異或許還不是影響的關鍵，而是「建構主義」本身的「本體論」問題。簡言之，到底建構主義是什麼？此根本問題恐怕會是此建橋計畫的關鍵因素。誠如本文一開始即指出建構主義學者至今仍對建構主義並無共同的語言或理解，如何進行對話與溝通呢？建構主義學者就必須先對話其社會本體論的意涵、內容與範圍，即是理念因素是要「部份到底」（partial the way down）還是要「一路到底」（all the way down）？Wendt（1999:92-138）就指出理念因素不是一路到底，而是理念的分散（distributions of ideas）與國際體系結構是國際政治最基本的因素。但是理念因素的厚薄程度又是如何界定？此問題也就影響激進建構主義是否是屬於建構主義範疇，強將差異其

²² 例如 Anna Leander (2004); Vincent Poulliot (2004).

²³ 例如 Stefano Guzzini (2000).

²⁴ 所謂的 sociation 是指個人之間的互動而形成了社會。Lars-Erik Cederman and Christopher Dasse, (2003).

大的激進建構主義納入，反而造成激進（後現代）建構主義與傳統（現代）建構主義能否對話的問題。不僅如此，找出造成理念改變的關鍵狀況（critical junctures）成為建構主義在建立中間道路時重要的研究議題（Risse and Wiener, 1999:779-780）。

就非主流建構主義學者對於主流（現代或溫和）建構主義學者 Wendt 的批評而言，²⁵尤其是後現代（激進）建構主義者²⁶在知識論上涉及到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問題（question of foundation），即是否相信世界能以中立或客觀的程序予以測試或評估，前者（基礎論者）認為所有的真理主張皆可判定真偽，後者（反基礎論者）則認為真理主張是不能判定真偽，因為是不存有客觀的立場來判定（Smith, 1995:29-30; Doucet, 1998）。²⁷後現代主義是以反基礎論為基礎，質疑國際關係理論的後設理論敘述，進而重新解構或建構其本身的後設理論觀點。然而，後現代主義重組現代主義理解的基本問題，其所強調的不在主體（即作者/獨立國家）或是客體（即獨立世界/文本），而是在建構出主體與客體（和理論與實踐、事實與價值）的歷史、文化與語言的實踐（George, 1994:192）。這樣的觀點是否能融入現代建構主義，或是不屬於建構主義而是屬於反思主義；或現代建構主義是淡薄的反思主義，後現代建構主義是濃厚的反思主義？

若是如此，則此項建橋計畫就必須觀察主流建構主義能否與非主流建構主義的溝通及匯合，尤其是不能違反後者在知識論、方法論與規範觀點的原則（Price and Reus-Smit, 1998），進而使建構主義內部對於知識論相對主義能有共識，從激進的實在論而到另一個激進的反實在論，兩者之間能有相通之地。幸而，後現代主義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上主張拒絕實證主意、提倡反基礎主義、提倡多元論述、對異同問題（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的語言分析等特性（Keith Webb (1995)）。這與詮釋建構主義的主張相差不遠，兩者都是「非基礎論者」（nonfunctionalist）的反基礎論（Francois Debrix, 2003），是可以尋得溝通之路，尤其建構主義在知識論的主張上，並不認為只有一個單一的知識論而是多元的知識論，差別的只是研究方法而已，如「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回饋迴路」（feedback loops）、歸類技巧（bracketing techniques）等研究方法（Checkel, 2006; Johnston, 2005; Finnemore, 1996），²⁸也就是接受建構主義理論概念、研究方法及

²⁵ 例如 Richard Price and Christian Reus-Smit (1998); Friedrich Kratochwil (2006).

²⁶ 例如 Jim George (1994); David Campbell (1992).

²⁷ 基礎論者是認為知識或真理可以判定真偽，反基礎論者則主張知識或真理無法判定真偽，因為各種理論各有其立場，沒有中立的根基來判定知識的真偽。基礎論者探究的是各種知識的「後設理論的根基」，以判定知識的真偽；反基礎論者則不認為如此（Smith, 1997:167-168）。

²⁸ Andrew Moravcsik 和 Checkel 曾就過程追蹤方法進行辯論，參閱 Jeffrey T. Checkel (2001a,

知識論的多元，以鼓勵建構主義之間的對話與相互學習。這樣的觀點同時也進而引發學者在第四次大辯論中，從事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以綜合兩者的理論觀點。

建構主義之間是相互補充的而不是相互競爭，就建構主義學者而言，知識論並不是植基於（哲學）理性主義而是傳統（convention），知識不曾獨立於形成知識本身的知識社群之外（Dunne, 1995:373）。務實的知識論中間地面能增進了不同學科、理論與研究途徑之間的對話，以及知識的累積（Sil,2000）。因此，建構主義學者能以務實的知識論觀點看待內部的知識論差異，進而在內部形成知識論共識，從多元論到建立中間地面或溝通橋樑，能使國際關係學界更能清楚地理解建構主義的範圍、內容與觀點，尤其是內部的知識差異。換言之，所有的建構主義者都強調知識主張是受到系絡的限制（context-bound），也是歷史偶然的（historically contingent）。……我們不應讓因果關係的論述遮蔽了我們基本的同意，我們不應以知識論的裝模作樣而轉變（知識論）話題（Klotz, 2001:232）。

建構主義在知識論上持續沒有一致的看法，可能有礙於出現較為合作的、整合的比較研究領域（Sil,2000）。如此一來，所謂的理论對話與綜合也就不可能存在了。但社會研究的本質之一是分析折衷主義，必須強調理論對話，學者能共同運用各種不同觀點理解複雜的真實（realities）（Katzenstein and Sil, 2005）。雖然Wendt（1999:40）並不是要找到折衷的知識論而提倡中間地面，但國際關係理論學者藉由評估、綜合與反思不同的理論立場而建構一致的分析架構的過程，而成為「自我意識的理論折衷主義者」（self-conscious eclecticism）（Makinda, 2000）。若是如此，則建構主義內部的建橋計畫是否就意味著知識論的理論折衷呢？似乎答案是肯定的。尤其隨著建構主義以問題為研究取向，建構主義學者藉由不同的問題發展階段序列（sequencing）與適用範圍（domain of application），（Jupille et al., 2002, 2003: 7-40），²⁹選擇不同的知識論立場與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共同組成其完整的建構主義解釋。這似乎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所較為樂於接受的方式，因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歷經多次大辯論，所呈現的特點之一就是綜合不同的理論學派而共同研究國際關係實務，在務實的考量基礎上，學者是會不斷提出溝通各方不同立場的橋樑，即使是現實主義學者與後現代主義學者也嘗試橫越兩者之間的隔閡，³⁰以促使國際關係理論更能對話與綜合。

2001b); Andrew Moravcsik (2001)。

²⁹ 階段序列是指考量各理論解釋序列行動中的特定階段或步驟；適用範圍是指考量各理論適用的範圍，選擇適合的理論解釋適用的部份，而共同組成完整的解釋。參閱 Jupille, Caporaso, and Checkel, (2002;2003)。

³⁰ 例如現實主義學者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與後現代主義學者 Rosemary E. Shinko 結合雙方論點

結論

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分歧與建立溝通橋樑，無論是實證主義或後實證主義的知識論主張，其所要爭論的是本體論能否與知識論區隔？實證主義的物質本體論與經驗（解釋）知識論，以及後實證主義的理念本體論與反思（理解）知識論，能否相互結合成為實證主義物質本體論與後實證主義反思知識論，以及後實證主義理念本體論與實證主義經驗知識論？³¹中間道路的現代（傳統）建構主義是在重新建構而非挑戰理性主義，詮釋建構主義與激進建構主義是在解構、挑戰理性主義，乃至中間地面的建構主義，如何在不同知識論的建構主義之間也能建立溝通橋樑，正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主題之一，即使許多學者提出建橋計畫，但仍需觀察後續的發展與其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影響。

Pernille Rieker (2004) 認為國際關係研究應以「問題導向」(problem-driven) 而不是「理論導向」(theory-driven)，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是相互補的研究途徑，兩者混合更能完全地掌握當前動態的範圍。遂有些學者 (Risse-Kappen, 1996; Check, 1997; Bill McSweeney, 1999: 203-207;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 2004; Andreas Gofas, 2002) 嘗試整合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以及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而成為「自由建構主義」(Liberal Constructivism)、「新自由建構主義」(Neo-Liberal Constructivism)、「現實建構主義」(Realist Constructivism) 或「建構現實主義」(Constructivist Realism)。隨著這樣的綜合理論出現，建構主義內部仍有結合自由主義的自由建構主義與非自由建構主義之間的對話正在進行，爭論的是自由主義能否沒有破壞建構主義的後設理論基礎而與建構主義相容；以及 Onuf (1998b) 出版 *The Republican Legacy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 可能引發建構主義共和理論基礎的爭論，即是康德「世界主義」(cosmopolitan) 思想與韋伯「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 觀點之間的爭論；還有現代建構主義的自由主義議題引發第三世界國家反自由主義的爭論 (Adler, 2002: 109)。換言之，建構主義內部的爭論仍是值得後續的研究與理解。

就美中台三邊的相對權力、國家安全、論述結構與認同問題，研究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台關係 (Sterling-Folker and Shinko, 2005)。

³¹ 這也是 Kratochwil and Ruggie (1986: 764) 在研究國際典則所指出的問題。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莫大華(2002),「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原型、分類與爭論—以 Onuf、Kratochchwil 和 Wendt 的觀點為分析」,《問題與研究》,41,111-148。
- 莫大華(2003a),「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辯論:國際關係理論的另一次大辯論?」,《政治科學論叢》,19,113-138。
- 莫大華(2006),探索國際關係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手稿)。

二、英文部分

- Adler, Emanuel (2002),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Beth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95-118,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Ashley, Richard(1987), “The Geopolitics of Geopolitical Space: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ternatives*, 12:4, 403-434.
- Ashley, Richard(1988), “Untying the Sovereign State: A Double Reading of the Anarchy Problematique,” *Millennium*, 17:2,227-262.
- Campbell, David (1998a), *National Deconstruction: Violence, Identity, and Justice in Bosnia*,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ampbell, David (1998b),*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rev.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ampbell, David, 1999, “Contra Wight: the Errors of a Premature Writ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2,317-321.
- Checkel, Jeffrey T. (1998),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50:2,324-348.
- Checkel, Jeffrey T.(2001a), “From Meta-to Substantive Theory?: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Europ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2:2, 219-226.
- Checkel, Jeffrey T. (2001b), Constructivism and Integration Theory: Crash Landing or Safe Arrival?,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2:2, 240-249.

- Checkel, Jeffrey T. (2001c),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3, 553-588.
- Checkel, Jeffrey T. (2004), "Social Constructivisms in Global and European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2, 229-244.
- Checkel, Jeffrey T. (2005), "It's the Process Stupid! Process Tracing in the Study of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NA Working Paper*, WP05/26.
- Checkel, Jeffrey T. (2006),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RENA Working Paper*, WP06/06.
- Christiansen, Thomas, Knud Erik Jorgensen and Antje Wiener, eds. (200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 Doucet, Marc G. (1998), "Standing Nowhere(?): Navigating the Third Route on the Question of Foundati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Millennium*, 28:2, 289-310.
- Dunne, Timothy (199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 367-389.
- George, Jim and David Campbell (1990), "Patterns of Dissent and the Celebration of Differenc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3, 269-293.
- George, Jim (1994),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Hoffman, Mark (1987),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Millennium*, 16:2, 231-249.
- Hoffman, Mark (1988), "Conversations on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17:1, 91-95.
- Hopf, Ted (1998),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1, 171-185.
- Hopf, Ted (2002),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en, John Kurt (2003), "Dueling Constructivisms: A Post-mortem on the Ideas Debate in Mainstream IR/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9:1, 39-60.
- Jupille, Joseph, James A. Caporaso, and Jeffrey T. Checkel (2002), "Integrating Institutions: Theory, Method, and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ENA Working Papers*, WP02/27.
- Jupille, Joseph, James A. Caporaso, and Jeffrey T. Checkel (2003), "Integrating Institutions: Rationalism, 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1: 1/2, 7- 40.
- Katzenstein, Peter J. (1996),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J., 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 (199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2,645-685.
- Klotz, Audie, (2001), “Can We Speak a Common Constructivist Language?,”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pp.223- 235, New York: M. E. Sharpe.
- Kratochwil, Friedrich V. (1989),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atochwil, Friedrich V. (2000),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Millennium*, 29:1, 73-101.
- Kratochwil, Friedrich V. (2006),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pp.21-47, London: Routledge.
- Lechner, Silviya (2006), “Missing Epistemology: The ‘Social’ and the ‘Theoretical’ in Wendt’s Social Theor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4th CEEISA Conference, 25-27 June, in Tartu, Estonia.
- Makinda, Samuel M. (2000),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5:2, 205-216.
- Marcel, Valerie (2001), “The Constructivist Debate; Bringing Hermeneutics (Properly) 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1 ISA conference, 21 February, Hong Kong.
- Nicholson, Michael (1996), “The Continued Significance of Positivism?,”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pp.128-1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ga, Toru(2003), “From Constructivism to Deconstructivism: Theoris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Culmination of Identities,” Paper presented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44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ebruary 25-March 1, Portland, Oregon.
- Onuf, Nicholas G., (2001), “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vism,” in Karin M. Fierke and

-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pp.236-254, New York: M.E. Sharpe.
- Pettman, Ralph (2000), *Commonsense Constructivism: Or The Making of World Affairs*, London: M.E. Sharpe.
- Pouliot, Vincent, (2004), "The Essence of Constructiv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7:3, 319-336.
- Price, Richard and Christian Reus-Smit, (1998), "Dangerous Liaisons? 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Constructiv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3, 259-294.
- Rengger, Nick (1988), "Going Critical? A Response to Hoffman," *Millennium*, 17:1, 81-89.
- Rengger, Nick and Mark Hoffman (1992),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 Doherty, E. Graham and M. Malek, eds., *Post-Modern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127-146,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 Reus-Smit, Christian (1999),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Culture, Soci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eus-Smit, Christian (2001), "Constructiv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09-23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Risse, Thomas, 2000,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1, 1-39.
- Rittberger, Berthol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2005),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Explaining the Parliamentar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Political Science Series* 104, Vienn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 Ruggie, John G. (1998),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855-885.
- Ruggie, John G. (1999),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215-245,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Schimmelfennig, Frank (2000),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the New Europe: Rat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Relations*,6:1,109-139.
- Schimmelfennig, Frank (2001),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1,47-80.
- Schimmelfennig, Frank (2003a), "Strategic Action in a Community Environment: The Decision to Enlarge the European Union to the Eas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1/2,156-183.
- Schimmelfennig, Frank (2003b), *The EU, NATO,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Rules and Rhetor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piro, Ian and Alexander Wendt (1992), "The Difference that Realism Makes: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Cons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20:2,197-223.
- Sil, Rudra (2000), "Against Epistemological Absolutism: Toward a 'Pragmatic' Center," in Rudra Sil and Eileen M. Doherty, eds., *Beyond Boundaries? Disciplines, Paradigms,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145-175,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mith, Steve (1995), "The Self-Images of a Discipline: A Genea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p.1-37,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Sterling-Folker, Jennife and Rosemary E. Shinko (2005), Discourses of Power: Traversing the Realist-Postmodern Divide, *Millennium*, 33:1,637-664.
- Weldes, Jutta (1996), 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275-318.
-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2,393-394.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ener, Antje, 2001, "Social Facts in World Politics-The Values-Added of Constructivism,"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the 42nd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February 20-25, Chicago.
- Wight, Colin (2001), "Too Much Constructivism in Too Many Wor(l)ds," Workshop on "(Re)Constructing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October 6,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投稿日期：95 年 6 月 21 日；採用日期：95 年 8 月 2 日)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建橋計畫—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